

文革博物馆（三）

• — • — •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十三期 ——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六日出版)

【“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楚，最好是建座“文革”博物馆。】

巴金《随思录》 第五卷《无题集》

本期目录 (zk9604d)

1.【自由论坛】	两个文化大革命刍议	郑 义
2.【争 鸣】	“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	喜 东

意见和建议请寄: cnd-cm@cnd.org, 来稿请寄: HXWZ@cnd.org

请在来稿中注明您的姓名和电子邮址（如愿用笔名或不署名也请注明），

若是文摘，敬请详细注明原稿的来源和出版时间，谢谢！

凡原载于本刊的文章，除非本刊另有安排，请勿在营利性出版物上转载。

本刊所载的任何形式的稿件均不一定代表编辑、《华夏文摘》或CND的观点。

【自由论坛】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两个文化大革命刍议

• 郑 义 •

〔仅以此文纪念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罹难者〕

日月荏苒，那场曾激动过千百万中国人而最终又给千百万中国人带来深重苦难的文化大革命，竟然已过去三十年了。

三十年对历史不过弹指一瞬，但对于一代人的生命却是几乎半生的岁月。在这段不算太短的岁月里，我们都思考了一些甚么呢？痛定思痛，我们对自己和后人该作出怎样的交代呢？不堪回首却又必须回首，那些尚未飘散的血光中必然有某些东西，值得我们永志不忘。

可能我是中国大陆最早正面否定文革的作家。一九七九年春，我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小说《枫》和后来根据这篇作品改编的连环画和电影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并一度遭到查禁。特别是电影，成了一个事件，在中南海里挨家挨户放了一个月，无人敢表态支持。最后中共最高层“集体看片”，当时主持工作的华、叶、胡、赵全体到场，才勉强同意公映。但是，无论在言论或文字上，我从未使用过“彻底否定文革”这个流行口号。八十年代后期，在发表于《作家》月刊的一篇文章中，我明确提出了“两个文革”的分析。第一个文革：毛泽东的文革，这是一个利用群众运动冲垮共产党权力结构，从而打倒政敌，以夺回旁落大权的高级权力斗争。第二个文革：人民的文革，则是一个利用皇帝，打倒贪官污吏，争取自身权力的不自觉的带有民主色彩的人民起义。在《历史的一部分》（1989）和《红色纪念碑》（1991）两书中，我做了进一步论述。在纪念文革三十周年之际，我对自己过去的观点又进行了思考，对“奉旨造反”的重大局限有所反省。这一修正使我认识到，在充分掌握材料并对历史作过细研究之前，这仍然是一个粗糙的假说。我不过抛砖引玉，希望有识之士早日完成这一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大课题。

此文也为了纪念文革中一切被凌辱、被迫害、被杀戮的人们，无论他们的观点、派别和地位如何。

◇ 血腥恐怖的文革之初

现在，海内外学术界对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利用人民来清除政敌这一点已有共识，那种认为毛迷醉于崇高革命理想的解释已显得过于浅薄天真。但是，对于文革中的民主因素即第二个文革尚认识不足。这一点恰恰十分重要。在文革中受到打击尔后又官复原职的人们都非常乐意攻击第一个文革，都非常乐意把文革描绘成一场朱元璋杀功臣的疯狂。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此来掩盖民众在文革之中针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正义愤怒，和反对他们所缔造与维护的制度的民主追求，从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不义暴君的无辜受害者。在他们嘴里，所谓“彻底否定文革”的“彻底”二字，多半正是指向那个人民的文革。

在这种众口一词的“彻底否定文革”之声浪中，我一次又一次反省作为参与者的我们在文革中的狂热。那种不惜牺牲自己个人一切乃至生命的狂热，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外，难道就没有更为深刻一点的历史动因了吗？不，那种狂热绝非宗教迷狂与愚昧可以一言以蔽之。当时，我们都真切地感受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解放感。毛泽东就是解放的旗帜！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支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通过。数日后，我的母校清华附中一群高干子弟得了风气之先，在与学校一墙之隔的圆明园废墟里秘密集会，成立了举世闻名的别动队——红卫兵。不久，毛泽东发表了一封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造反”的公开信，于是，全北京的干部子弟纷纷组织起来，为毛泽东而战，为维护和强化特权制度而战！他们将矛头指向那些早已饱受压迫的平民与贱民，指向那些据说胆敢压制他们，对他们的特权尚有所限制（比如，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比如师道尊严）的学校领导。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红卫兵如希特勒的党卫军（名字也雷同）一样冲出校园，“杀向社会”。在公安机关的纵容与密切配合下，刹那间，北京城变成一个巨大的刑讯室、集中营和刑场。一个周末，我从位于西郊的学校骑车回家，一进城，就发现这里已经成了人间地狱。街边上到处是倒卧的尸体及垂死者；一队接一队的幸存者无人看押而自行游街示众，胸前的牌子或血淋淋的衬衣上赫然写着“地主”、“逃亡富农”、“右派”、“历史反革命”、“坏份子”、“现行反革命”、“老流氓”、“投机倒把份子”、“妓女”、“一贯道”、“反动修女”、“资本家”、“资方代理”、“小偷”、“反动学术权威”、“劳改犯”、

“漏网右派”、“大破鞋”……他们戴着纸糊的高帽，敲着脸盆，步履蹒跚地缓缓移动。老红卫兵滥打乱杀，不仅私设公堂，而且刑罚残酷。有跪煤渣、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火烧头发、刀剁屁股、开水洗澡等等。监房里还有人血写成的大标语：“红色恐怖万岁！”那些可怕的日子里，几乎每一个街区都有惨死者，到处都有无辜者的鲜血。一向以学习成绩与田径比赛名次傲视北京的清华附中现在以“造反”闻名全国了。年轻有为的校长被剃了“黑帮头”，每斗必打，死去活来；留苏归来的团委书记被打瞎一只眼睛；我的班主任挨打不过，从大烟囱上跳下来死得粉身碎骨；我高一时的同桌女同学因爱看“封资修”小说，多愁善感被斗服毒自杀，红卫兵跑到医院不准抢救，让这位没有伤害过任何人的娴静的姑娘经历了漫长的死亡。我出身于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家庭，从懂事起就明白自己是这个社会里最无生存权利，最受凌辱的不可接触的贱民。纵然我品学皆优，努力“改造”，但我的厄运生来已定。文革之初，母亲被批斗毒打之后赶下农村劳改，我在学校被“工作组”定为“右派学生”，“老红卫兵”又视我为“狗崽子”，将我毆至重伤，九死一生。巨大的荣誉感和权力欲使这些红卫兵的创始者们尚较为克制，可以说我因此拣了一条命。

随着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小将”，随着“革命大串联”，这个青年法西斯运动迅即席卷全国。在京畿地区的大兴、良乡和湖南道县发生的大规模集体屠杀等事件，把中国人推入了史所未见的政治大恐怖。

在这里要做一点十分必要的补充：在这个毛泽东煽动的“红色恐怖”之前，还有一个刘少奇制造的没有流血的恐怖。由他派出的工作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大抓“右派”、“反革命”，不算百余所中学，仅二十四所大学就有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此一比例绝不亚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

◇ 反抗中共暴政：第二个文革的兴起

一九六六年十月，《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将前段时期的“红色恐怖”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极其严重的口吻指出这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号召人民打倒这条“资反路线”，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所谓“红旗十三期社论”，对于正是得势的红卫兵，简直是迎头一闷棍。而前一时深受迫害的人们却乘机揭竿而起，纷纷以被毛肯定过的“红卫兵”旗号组织起来，与“老”红卫兵对着干，将斗争的锋芒直指“老”红卫兵们的老子——党内走资派。“第二个文革”在人民的血泊中萌动了。这篇社论，无疑是文革之初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中共建政十七年来，这是人民第一次名正言顺地获得反抗共产党专政的机会。过去，对现实仅仅“不满”都是严重罪行；就在昨天，无辜者的鲜血还流满革命的祭坛；现在天地翻覆：不是百姓，而是共产党各级干部成了革命的对象了！始终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以不是专政的对象，可以站起来“造反”、做人。而且，这种个人的解放感又与“打倒走资派”、“继续革命”、“解放全人类”等意识形态图腾结合，使人们获得了一种感受上、精神上的大解放。理解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当时那些铺天盖地的、不厌其烦的、巨大的标语：“誓以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毛理所当然地成了老干部和老红卫兵切齿仇恨的对象，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万众景仰的“导师”、“领袖”、“舵手”和“统帅”。

当我走出北京，介入外省运动之后，更感受到民众之中的这种解放感。如四川文革中反复血战争夺的焦点宜宾，两派工农民众都控诉“困难时期”每天只吃“三两七钱五”，都造共产党的反，只不过一派认为罪魁祸首是市委书记和地委书记，一派认为是省委书记兼西南局书记李井泉。文革中对中共建政以来十七年的评价针锋相对：老红卫兵和保守派认为十七年要肯定，否定十七年就是否定共产党，就是

“牛鬼蛇神翻天”。而造反派则在不同程度上否定十七年（除了抽象地绕开与毛直接有关的“合作化”、“反右”、“三面红旗”等），借批走资派而对共产党展开猛烈攻击。因为广大民众确实身受中共统治之苦。据文革中揭发的材料，广西区党委书记乔晓光曾这样描述他治下的人民生活：“广西的农民吃得很差，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不能跃进，穿的实在破烂，住的是破烂屋，一个房子住几户，西部地区是‘五畜同堂’，牛、猪、鸡、鸭、人住在一起，至于行，就是两条腿加一根扁担。”

据胡耀邦时期新修的广西上林县志称，中共干部对农民十分残暴：

干部的“四风”（强迫命令、瞎指挥生产、生活特殊化、虚报浮夸）问题更严重。大丰公社原有九个党委书记（副书记），其中有五个亲自踢打过群众。三十一个社干部中有十一个毒打过社员。公社书记打过十二人。在大理搞粮食安排时亲自动手打了人，逼出三百六十斤粮食开小型现场会，总结推广打人征粮“经验”。到云城又毒打社员×××，逼出三十斤粮食后，继续翻箱倒柜，还拿全村老百姓来跪。云城工作组共七人，人人动手打人，共打群众二十六人。用拳打，用脚踢，用木打，用电筒打等。打得×××头肿得七天梳不了头，半个月不能出工。群众揭发说：“×××是“五挂帅”书记。”即打人、跪人、打鱼、杀鸡、杀鸭五挂帅。公社副主任×××打过三十六人，被打者最老的八十多岁（二人），最小的十三岁，有的被迫在田头生小孩，还有三个妇女被折磨致流产。公社干部×××于一九六零年前后三个月中，先后在云城、云黄等地打过六十四名社员，有的被打得头破牙崩。其不但自己动手打社员，还命令群众互打，叫父亲打儿子，儿子打父亲，打完还不够，还把父亲和儿子头互碰。

公社干部如此，大队干部更加恶劣。云石大队十一个干部中有九个是打过群众的。全大队被踢打和不给吃饭的共计二百零一人，占全大队成年人的71%。云黄大队八个干部中，没有一个没打过群众的。队长说：“干部不打人不是好干部。”云黄大队挨打的六十六人，挨跪的八人，不给吃饭的七十人，罚立正的十六人，共计一百六十人，占全大队成年人64%。新生大队社员被干部打、跪、不给吃饭的一三五人，占全大队成年人的85%。同时还不给社员吃饭、罚做苦工、多方刁难。有个大队长吊打社员后，又用火来烧。云城大队×××用蚂蝗咬社员十多人。

打人、罚跪、不给吃饭，诸如此类队队都有，而且手段之多，计有：拳打、脚踢、罚立正、罚跪、捆绑、上吊、扛木、挑水、罚跑步、拔胡须、扣口粮、扣工资、夺饭碗、看饭盅、游全村、游田埂、背石头、封门口、插白旗、假枪毙、戴高帽、用火烧、罚苦工、顶北风、放蚂蝗咬、晒太阳、放牛进屋、丢石入房、带病出工、打鼓喊冲锋等三十多种。

文革中，对现实强烈不满的各阶层民众，都聚集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大旗下，获得了公然反抗的机会与权力。时至今日，海内外还有人对手对文革之前的“十七年”十分怀念，其实，“十七年”是一个更为黑暗的时代，是一个黑暗到连一丝微弱的反抗之光都透不出来的政治黑洞。在严密的无产阶级专政下，任何一点最轻微的抗议都会被扼死在喉管里。连对一个小小的支部书记甚至普通党员提意见，不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罪在不赦吗？文化革命了，天地翻覆了，人民不仅可以利用“四大”公开地表达不满，而且还可以批判、打倒、夺权，小至支书，大至中共政治局委员、副主席、国家主席。“十七年”里，任何非官方的组织一律是“反党组织”，杀头坐牢。现在不仅可以自由组织，甚至还可以（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权利。

从未在铁桶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生活过的人们，是绝难体会到这种天翻地覆的解放感的。

所以，我宁愿把人民的文革定性为中国当代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反抗共产暴政的人民起义，而不同意把人民大众投入文革理解为一种愚昧无比的“大疯狂”，理解为一种上当受骗的毫无主体精神的被动。任何一个规模巨大的群众斗争，必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动因。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说过：“……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于自己的行动毫无知觉，直到很久才会发现为甚么要这样做的原因。而且我们总是满足于对自己的一切行为的‘合理化’解释法，直到最后才发现这些解释都是些不恰当的借口罢了。”（《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虽然文革口号纷杂，目的含混，但反抗暴政却是其之所以波澜壮阔，势不可挡的最根本的动因。仅以“个人迷信”，毛振臂一呼是无法解释这场席卷四分之一人类的政治风暴的。

◇ 相互利用的两个文革

到六十年代初期，毛已深感大权旁落。当时真正掌握权柄的，既不是所谓当家作主的“人民”，也不是所谓的“伟大领袖”，而是以刘邓为首的共产党官僚机构。在丧失了权力而仇视当权派这一点上，毛与人民找到了某种默契。

对于人民的仇恨与反抗，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同僚们是完全了然于心的。

在一次讨论并制定“四清运动”政策的最高会议上，有如下一段对话：

“刘少奇：有个问题，农村方面主要矛盾是什么？陶铸讲，农村已经形成富裕阶层，特殊阶层。他讲主要矛盾是广大贫下中农与富裕阶层、特殊阶层的矛盾。李井泉说，还是地富反坏、坏干部结合起来与群众的矛盾，是吗？（李井泉：是。）

主席：地富是后台老板，台上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搞）干部。地富反坏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主要是这些坏干部顶在他们头上，他们穷得很，受不了。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边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毛泽东思想万岁》）

关于人民和中共的尖锐矛盾，从毛到各省封疆大吏都是明晰的。如果说开始毛还没提升到理论的高度，那么至迟在文革前夕的一九六四年底，已经思考成熟：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份子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毛主席关于社教的批示》）

在“官僚主义者阶级”、“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份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等一系列尖锐用词里，文革已呼之欲出。毛老谋深算地决心利用人民与共产党的矛盾来打倒政敌，夺

回自己的最高权力了。半年之后，他先支持老红卫兵以“造反”这个犯上作乱的尖锐词句“杀向社会”，制造乱局，然后笔锋一转，把按共产党老规矩抓反革命以维持统治秩序的各级党组织定为“这次运动的重点”。不出所料，他得到了人民几乎是狂热的支持。本来，历经两千年专制政治残酷塑造的中国人是绝不敢轻言造反的。毛的号召，鼓动起人民的勇气，使一切反抗行为得到了最大的合法性。现在不反，更待何时？平时逆来顺受的人们如火山般喷射出仇恨的岩浆。几乎是在一瞬之间，顺民变成了暴民，以暴易暴，将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几乎悉数斗尽，全部打倒。——这样，毛和人民同时“找到了一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毛的权力斗争和人民的反抗相互交叉，相互利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种利用至高无上之道统与法统而表达民众自身权利要求的“造反”，我们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先例。

辛亥革命发轫之初，四川民众为了从政府手中夺回铁路主权，就曾利用过光绪皇帝的权威。因光绪帝早先曾发过一个“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的上喻，于是民众便祭起光绪来“造反”。当时成都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扎起光绪皇帝的“圣位台”，致使官吏频频下轿致敬。百姓还故意将“圣位台”扎得大而低矮，堵塞街道，使轿子无法通行。一时间里，象征着权位的轿子绝迹，官吏步行，大快人心。还有以光绪“圣位台”围困官邸的妙事：官吏要出门，下人禀告：老爷，前门出不得，皇上在前门外。要出后门：老爷，后门也出不得，皇上在后门外。结果居然是四门难出，恼恨而无奈。在愈演愈烈的对抗中，四川总督赵尔丰妄图以高压恫吓民众，逮捕了几位著名士绅。矛盾激化了。当天下午，数千民众群起赴总督衙门请愿。按中国的专制传统，聚众请愿几近造反。但百姓这次有护身符：光绪皇帝。民众手捧光绪“上喻”和光绪神位、线香，理直气壮地冲进总督衙门。残暴而愚蠢的赵尔丰下令开枪弹压，当场击毙三十余人，尸体和皇上的神位上喻一起倒在血泊之中。这一下好了：现在，不是百姓造反，而是总督大人造反了！全川各地纷纷起义，赵尔丰最后被冲进总督衙门的民众乱枪打死。在攻克成都时，自发的民众手持鸟枪、梭标、牛角叉以及锄头、挡耙、扁担冲进城门，却自己不知要干甚么！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要发泄，要造反！最后，利用过皇帝打击贪官的民众干起了辛亥革命，终于推翻皇权，缔造共和。这就是不敢轻言造反的中国老百姓不意中绕出的一个戏剧性的大圈儿。

众所周知，庚子之乱也包含了皇帝百姓互相利用的一方面。慈禧太后见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子，认为民心可用，便利用百姓的排外情绪驱杀“洋人”，以间接打击“洋人”支持的力主变法维新的“帝党”，稳固她刚刚夺回的最高权力。百姓则利用皇权的默许和支持，乘机扩大组织，实现自己的目的。虽然这目的混杂，甚至包含了愚昧迷信，但撇开价值判断，仅就政治运作层面而言，义和团也利用了皇权这一点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文革“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只“打倒”而无制度转型的明确诉求，当然反映了人民的不够成熟，其原因除了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之羁绊，更主要的还是当政者的蒙蔽。试想，在这样一个毫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铁幕国家里，民众何以了解苦难的范围及烈度？何以认清一切苦难的总根源正是道貌岸然的毛泽东和整个极权制度？在这种历史的条件下，民众也只能把反抗的矛头指向直接剥夺和压迫他们的贪官污吏。

◇ 毛泽东文革的必然失败

然而，这两个文革都归于失败。

第一个文革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一个少数反对多数个人反对全党的权力斗争。它所依恃的，是毛与人民直接的结盟。但是，这种结盟从本质上便是一种相互利用的结盟。毛泽东的文革和人民的文革完全是两回事情。可以这样说，在毛的“战略部署”中，根本就没有人民的文革这回事。众所周知，毛设计的文革不过是几个月。显然，他认为鼓动民众打垮政敌夺回权力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但是，就在几个月后按计划开始夺权之时，遭到了军方的拼死抵抗，即所谓“二月逆流”。军队上层一面在中南海与毛斗法，一面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血腥镇压造反派，仅四川一省便逮捕了数万之众。在这个生死攸关的严重时刻，毛与民众客观上已形成风雨同舟命运与共的关系。毛要想斗垮众军头，只有别无选择地全力扶起造反派。事实正是如此，此一回合之后，文革已成摧枯拉朽势不可挡。毛想要得到的一切已经全部到手，文革可以大体上按计划“胜利结束”了。

但出乎预料之外的是，“二月逆流”的大乱子生出了一个更不好收拾的大乱子：从“二月镇反”血泊中爬起来的造反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追杀过去，在为毛从烈火中夺取权力之粟的同时，发展壮大为有权、有人、有钱、有枪、有地盘的政治经济军事三位一体的实力集团。毛当然不会让人民真正地获得权力，实现他在文革之初曾经许诺的“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及一个没有压迫与剥削的大同世界。一旦大权在手，便打算尽快结束文革。但第二个文革已经在与第一个文革相互交叉相互利用中壮大成熟，开始提出自己的方向和权力要求。如当时的以湖南“省无联”为代表的造反派就明确提出了“权力再分配”的理论。人民不想解散组织，放下自己用鲜血换来的枪。第二个文革开始显示出自己真正的本质力量。毛泽东开始失去运动的控制权。到一九六七年下半年，人民的文革终于发展到可以向制度挑战之程度。如果假以时日，待人民从理论上也成熟起来，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就可能席卷全国。在这个对于整个极权制度的根本威胁面前，毛再次与军队结盟，在枪杆子的支持下，重建党政官僚机构，强行解散群众组织，大肆逮捕、杀害群众领袖。人民的文革被毛无情地绞杀了。

从中共官僚机构冲垮到重建，这是一个在政治谋略上绝对完美的圆圈。党又“领导一切”了，但在这个有意义的圆周运动中，对毛形成威胁的实权派代表人物被铲除（许多人甚至在肉体上也被消灭），毛的威望与权力达到了顶峰。应该说这第一个文革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但好景不长，由于毛扼死了他盟友——第二个文革，那种排山倒海力挽狂澜的神奇力量就此消失。又由于大动乱造成的经济崩溃和在党内树敌过多，加之和林、周之间的权争日益加剧，文革后期的独裁者显然已是身心交瘁。他知道他难逃彻底失败的厄运，悲叹文革将被“翻案”。他欺骗利用并最后镇压了人民，知道人民不会答应。他无情地蹂躏了多数派，知道多数派不会答应。他最后的岁月，就是在这种众叛亲离，唯恐“复辟”的恐惧中度过。果然不出所料：尸骨未寒，他所倚重的文革派——“四人帮”便在宫廷政变中彻底覆灭，举国欢庆。紧接着，文革中被打倒的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复出，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平反，文革遭到“彻底否定”。共产党以及他个人的神话不可挽回地走向破灭。

◇ 第二个文革的宝贵遗训

第二个文革的失败也带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利用皇帝反贪官，即利用现成的道统与法统反抗暴政，具有极大的合法性而不易招致立即镇压，容易形成声势浩大的规模，但无法摆脱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禁锢。因为这种意识形态的谎言已经成为“奉旨造反”合法性之依据。奉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之名，就必然落入编织得十分严密的专制主义谎言之网。如果是不自觉地利用，就会束缚我们的思想，以谎言为真实，反而“弄假成真”，加强了谎言的欺骗性；即便是自觉地利用，也会使我们“作茧自缚”，在历史机遇真正到来之际难

以超越这早已腐朽的政治框架，提出真正的民主诉求。因为这框架正是得到我们自己背书的合法性前提。很明显，“奉旨”就极难真正“造反”。“打着红旗反红旗”终究是反不掉“红旗”的。而且，由于这种利用多半是不自觉的，便往往反而被专制主义的道统与法统所利用，成为独夫民贼改朝换代的工具，最终很难逃脱“卸磨杀驴”的悲剧结局。“奉旨造反”使人民在文革高潮中获得了蔚为壮观的组织力量，同时，“奉旨造反”又使人民几乎命定地走向失败。

（但辛亥革命似乎是一个反证。如前所述，辛亥革命发轫之四川护路运动无疑带着利用皇权的色彩，为何却取得了推翻皇权的成功？我请教了历史学家辛浩年先生。据我的理解，大致原因有二：一、辛亥革命有民族色彩；二、辛亥之前，革命派同保皇派已进行过长期论战，并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推翻满清，实现共和的民主革命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也就是说，在护路运动和武昌起义之前，以中山先生为首的民主派已经从思想上组织上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这样，在历史机遇到来的时候，民众才有可能迅速抛弃曾经利用过的专制主义道统与法统，走上自己的自为之路。）

反被专制主义所用这种副作用，还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践踏人权：漠视人权特别是漠视“敌人”的人权这一专制主义的通病，也在“相互利用”中猛烈传染。共产党及其党卫军老红卫兵曾不择手段地残忍地对待过人民，造了反的人民也同样不择手段地残忍地报复共产党和老红卫兵。残忍是一种描述，问题的实质在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逻辑上是对专制主义践踏人权之道的再次肯定。这只会使历史在血泊中轮回，而不可能开创一个尊重人权的新社会。二、株连无辜：文革的对象“黑八类”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走资派”虽然排名最后，但是第一号目标。不言而喻，两个文革在对付“走资派”上都是竭尽全力的。但既然假“无产阶级专政”之名，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贯性对象——地富反坏右再加上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命定地合乎逻辑地同时被“横扫”。于是，一个骨子里反抗专制主义的群众运动，也被专制主义意识形态所裹胁，良莠不分，玉石俱焚，暴戾蛮横地株连无辜。三、毁灭文化：毛“破字当头”所煽动起来的砸玻璃、斗“权威”、焚书批儒，是一个横扫两千年文明的反文化运动。这种愚昧和文化虚无主义实质上是对专制主义反对异端和农民起义盲目破坏两大传统的再次肯定。痛定思痛，人们自然会对这些散发着专制主义毒素的疯狂痛心疾首。

要反对专制主义，就必须同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权力传承彻底决裂，这是第二个文革留给我们的宝贵遗训之一。

除了民众与“皇帝”的关系，民众内部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这里有一个不应回避的问题：既然第二个文革（即人民的文革）是人民与共产党大小贪官污吏的斗争，为何最激烈残酷的内战却暴发在各派群众组织之间？在声讨中共“十七年”黑暗统治，冲垮官办组织和各级共产党机构时期，各造反派组织大体是协同一致的。不幸的是，从夺权开始，面对填充权力真空，进行权力再分配之局面，造反派分裂成为誓不两立的两大派，使用了从长矛大刀直至机枪坦克的各式武器，血战起来。老当权派被打倒了，权力的继承者刚刚上台或即将上台。对于这个新的权力中心是否认同，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大派（即当时所称的“以人划派”）。其中自然有激进与温和之别，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在权力再分配中不同利益关系之对立。急于填补权力真空的新当权派或有可能成为新当权派的人物（如四川的刘、张，贵州的李再含，等等）拉一派打一派，以实力乱中夺权。而急于寻找代理人的民众也拥一个反一个，渴望权力分享。一般来说，双方都是有着光荣历史的响当当的造反派，双方都有从中央到地方到军队的支持者，争斗起来，自然难分高下。在群众组织内部，也同样存在这种“以人划派”的权力再分配之争（如清华蒯大富、北大聂元梓、北师大谭厚兰等都是这种内部分裂的符号人物）。在这种极其复杂的局面中，毛及其死党们自然因势利导，推波助澜，老练地运用各种政治手腕，如在

这段时间，这个问题上支持这一派，在另一段时间另一个问题上支持另一派，成功地分裂了民众，使他们互相抗衡，混战不休，无法团结一致，形成对极权制度的真正威胁，使控制权和最后收拾局面权始终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推到极端：假若毛不插手分裂民众，民众组织内部会自发地产生权力斗争而导致分裂吗？从海外民运的现状看来，恐怕结论是肯定的。第二个文革无疑具有某种民主色彩，但远未成熟到试图建立现代民主制度之程度。打倒不是制度转型，造反意在取而代之。不从根本上解决权力结构问题，权力争夺就先把我们自己从内部打垮。我们中国人，有忠君报国不惜肝脑涂地之传统，有揭竿而起反抗暴政之传统，有前仆后继追求自由之传统，但缺乏革故鼎新制衡权力的传统。渲泄仇恨是不行的，造反打倒是不行的，改朝换代取而代之也是不行的。这不仅不是自由之路，而且，这种无规则的权力斗争也给人民带来了太多的苦难。这就是一般民众也倾向于“彻底否定文革”的原因之一。

要反对专制主义，就必须同专制主义的权力制度彻底决裂，实行制度转型。

第一，削弱权力的相对值，使权力变得不那么值得拼死争夺：恢复公仆的原始意义、任期限制、不得连任和转让、大社会小政权——以民权削弱国家权力、私有化——以“金权”削弱政治权力等等。

第二，权力更迭制度化：普选制、政党政治、否认暴力夺取权力的合法性，军队国家化等等。

第三，以权力监督、制衡权力：立法行政司法新闻四权分立、弹劾、法制、普选、新闻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等等。

我想，这就是悲壮的第二个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训。

一九七九年，民主墙的代表人物魏京生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政治制度转型，警告通过宫廷政变上台并对人民实行让步政策的邓小平有可能成为新的独裁者。

一九八九年，八九民运明确提出不在共产党内寻找依靠和打倒之对象，而疾呼全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反对“造反”、“夺权”，坚持对话、和平、理性、非暴力。

虽然民主墙与八九民运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民主的理念已在中国人心中生根发芽。这正是我们将有可能避免文革式劫难而走向自由的希望！

□ 寄自美国

~~~~~

【争 鸣】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

• 喜 东 •

八十年代初以来，形成了评价文革的主流派观点，即“十年动乱、十年浩劫、一塌糊涂、一团漆黑、一无是处、应彻底否定”的一元化、绝对化结论，将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一笔勾销，对其间发生的极度复杂、层次繁多、交错曲折的各种事件，以极度简单化、概念化和概括化的方式向历史敷衍了事。

另一方面，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或稍微了解文革中群众运动的人，又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文革期间从人民群众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和参与意识。因此，在评价文革的舆论中，出现了偏离主流派的观点，这里指的就是一种貌似深刻的“两个文革”理论。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就是：

“……一个文革，统治者的文革：利用群众运动，摧毁政敌，攫取权力；一个文革，被统治者的文革：利用合法条件，反抗封建特权和政治的压迫。——这是两个互相利用、同时又互相冲突的文革。而共同的时、空把二者融为一体，就使得这融合体成了一个说不清、弄不懂的政治怪物……”<sup>①</sup>

王希哲是文革后时期最重要的民间理论家和民主运动人士之一。在李一哲《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著名大字报中，他的文革观和本文是很接近的。然而，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王希哲的观点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这时他已经将文革理解为一个“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和一个“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sup>②</sup>

应该看到，“两个文革”论和“彻底否定”的官方一元化观点比较起来，看到了精英之外的群众和群众政治，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它试图将毛泽东的“造反有理”的思想与文革中的群众造反运动割裂开来，而不承认在中央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和社会上造反派与保皇派之间的斗争有着脉络清楚的联盟和对立的关系。在怎样解释群众运动性质上，囿于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对来自群众的自发的左倾思想，和群众对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追求这些事实，感到无法接受，一定要给文革中的群众大民主贴上“追求自由化”、“反对共产专制”的标签。这其中还有一个很深刻的问题，那就是从左的方向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和民主化的可能性问题，这个问题下面再详谈。总之，“两个文革”论者一方面盛赞文革运动期间的大民主、集会结社、和反官僚运动，另一方面认为毛泽东和群众在各说各话：毛泽东在追求“僵化的社会主义”，而群众在追求“自由化”；甚或干脆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官僚派的形“左”实右的整人手段混为一谈，在一定程度上和官方“一团漆黑”的观点合流，把文革中两条路线的思想斗争看作是对个人政敌的整肃清洗。

这里还应提到文革中民间左派纲领性文件《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的作者杨曦光（杨小凯）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他认为：毛泽东和党内文革派发动和支持了群众造反派的反官僚、反迫害的运动，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政治联盟关系；所谓“互相利用”的说法是无意义的，因为政治的本质就是建立联盟、互相“利用”。在这一点上，杨曦光是在所有参加过文革造反运动的人士中，自始至终坚持自己原来观点的人，而没有象许多敏捷善变、富有机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那样，受到官方操纵性的语言的影响。然而唯一遗憾的一点是，作为文革中最著名的民间左派理论家，在文革过去二十多年后，杨小凯认为造反派运动受其社会来源的构成的影响，其真正思想倾向是右倾的。<sup>③</sup>

“两个文革”的观点，目前在亲身参加过文革、特别是那些当过造反左派的人们中较为流行；然而，不难发现，这个观点，是在清算文革、保守复旧的风潮的影响和压力下，有造反经历的人在心理上对官方“彻底否定”的观点让步和妥协的结果。实际上，从六十年代末开始，随着翻文革案的风潮愈刮愈紧，转向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就在文革刚开始时，那些对文革有反感的人、持极端保守观点的人就已经“看透”，把当时发生的一切都视为革命口号掩盖下的一场精英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实际上，将革命归结为“精英操纵群众实现个人目的”的观点，是有历史传统的：十八世纪极端敌视革命的英国保守思想家艾德蒙·伯克，就系统地发展了这个观点，用来彻底否定当时的法国大革命。从那时起，近代史上的每一次革命，都伴随产生出一个彻底否定该革命的理论，这些理论全都有如下这样一种千篇一

律的程式：一切革命的本质都是一小撮精英野心家欺骗利用头脑简单的群众，因此群众造反是违反群众自身利益的，所以，群众通过革命所能得到一切，本可以花小得多的代价通过统治阶层的渐进改良来实现，而无需伤及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在这些革命否定论中已经蕴涵着“两个革命”的意味，即把一场革命看成是精英的争权夺利和暴民的红色恐怖的“融合体”。造反派老战士们转向“两个文革”观点，无疑是为进一步否定他们自己的亲身革命经历准备了自杀的绳索。

让我们来具体分析文革运动中，上层与群众、“继续革命论”与血统论、两个司令部与两大群众派别之间的联盟和对立关系的形成和演变，以此说明无论是“精英权力斗争”论，还是“两个文革”论，在历史的事实面前，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两个错误论点的论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毛泽东担心死后有人仿效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所以才反对赫鲁晓夫，最后发动文革；(二)毛泽东再搞一次“阳谋”，向一些人“交了底”，而没向另一些人“交底”；(三)精英在幕后操纵了群众“炮打”高级领导人的活动；(四)群众反官僚、反迫害的运动与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毫无关系。

### 有关毛泽东的“斯大林”情结的神话

首先来看所谓的毛泽东的“斯大林”情结。以毛泽东这样气魄的政治家和革命家，去推测他反对赫鲁晓夫、发动文革是出于私人动机，这样的思路很渺小、很卑劣。中苏两党分歧的原因，除了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无原则、无策略地全面诋毁斯大林之外，还有更重要、更深远的原因。当时和苏共一个更主要的分歧是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问题：战后帝国主义围剿新中国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却愈来愈向美国妥协投降，成为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和合作者。其它分歧包括对南斯拉夫式社会主义改革的看法，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的不同政见等等。在这一系列冲突中，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共采取了捍卫原则、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节的正确做法。而苏共采取了粗暴傲慢、强权政治的无原则做法。这才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不可避免地决裂的真正原因。至于毛泽东对斯大林问题的态度，事实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最先有警觉，坚持走出有所创新的、避免苏联弊病的社会主义道路；反而是苏联的新领导集团只知道抓住“个人崇拜”问题不放，却全盘继承了斯大林遗留下来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和缺少群众参与的政治社会制度，而从未想过作制度上的调整或革新。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党内的保守派、亲苏派，是主张将苏联体制一成不变地全盘照搬到中国来的，在他们心目中，从来是对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的一切都加以盲目崇拜的。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们，而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在理论上、实践上的各种错误，在各种场合下多次加以指出、批判，对迷信苏联体制的人提出警告。因此，将文革看成是维护中国的“斯大林主义”、针对未来的“秘密报告”人的政治清洗，是将历史事实几乎整个颠倒。

### 向谁交底、没向谁交底

第二个有关“两个文革”的津津乐道的说法，就是文革运动一开始就向有些人“交了底”，而没有向另一些人“交底”，因此，知根知底的人在文革中没有说错话、办错事，因而没有倒台，而不知内情的人（刘少奇、邓小平等），受骗上当，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工具。这种看法不仅是从精英式的宫廷政治角度看问题，更带着阴谋理论的色彩。以这种观点看，中共内部一切政治斗争都是无原则的山头派系之间为了私利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然而事实是，中共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最注重意识形态和主义原则的一个政党，和世纪初的各种政党军阀政权相比，和曾是革命党和执政党的国民党相比，中共更是靠着对一种理念的执着，最后赢得了全民族的民意。中共内部的重大派别从来不象国民党内部那样以山头实力为基础，而总是按意识形态、按路线上的认同和分歧为基础。

毛泽东开展文革的基本思想，进入六十年代后开始渐渐形成；而毛泽东在思想方面一步步的变化，也是全党共知的。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公开的分歧。刘少奇公开承认，对毛主席的思想开始感到跟不上了。相反，在党内也一直存在着一个和毛泽东在思想上基本一致的思想阵营，包括柯庆施、陈伯达等。毛泽东并没有对同一思想阵营的人能多交代什么，因为毛泽东的“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提法（六二年），“党和国家有可能变色”的提法（六三年），“中央会出修正主义”的提法（六四年），“官僚主义者阶级”（六五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六五年）的提法等等，一步步地廓清了他有必要进行文革的思想，而这些新提法，都是在党内公开提出的，对党内所有人都是有所交代的。对毛泽东的这些特异思想，党内大部分人不理解，一小部分人有所理解，这就是文革开始时党内的状况。对于不理解的人，文革的作法对他们来说，只能揣测是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因‘大权旁落’才要‘清洗功臣’”等等阴谋、“阳谋”理论也就应运而生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刘邓派出工作组整群众，引发了他们后来的倒台。这成为毛泽东没有向他们交底的经典例证。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并不存在着什么交不交底的问题。毛泽东在怎样对待学生闹事的问题上历来的言论，如“不要怕闹，闹的越大越长越好”等等，刘邓是最清楚不过了。毛泽东六月十日在杭州还说过：“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当时党内许多人，包括刘邓的同情者陶铸等都在场。<sup>④</sup>刘邓的工作组政策，并非是因为没有得到毛泽东的交底，而是在执行自认为正确的党的路线，有意识地抵制他们认为错误的毛泽东路线。

在多数有关文革的文献中，只提“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靠边站，却不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左派干部也比比皆是，假如从被打倒的和没被打倒的比例来看，左派中被打倒的比例更大。其中包括中央文革派的重要成员，如王力、关锋、林杰、戚本禹、穆欣等，更有文革后时期被打倒的陈伯达。这说明两个问题：假如有什么所谓交底的问题，那么这些中央左派的核心人物反而没有给交底，导致了他们的垮台。另外，在文革运动后期左派被大批地打倒，是由于官僚保守派力量的强大，造成了左派阵营的瓦解，说明文革运动，即使是在上层，也一样是消长起伏的两派力量斗争，而不是什么单方面某一派的阴谋策划。

### 精英与群众

从“两个文革”的观点看，中央的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兴起只有时间上的重合，而没有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只有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而不承认是政治联盟的关系。这种说法不但无法解释中央的政治斗争为何要舍近求远到下层去点火，更无法客观地、系统性地和全面地面对文革的历史纪录。持“精英操纵”观点的文革史学所屡提不厌的一个例子就是康生与聂元梓等合谋制造了那张全国著名的反对北大党委的大字报<sup>⑤</sup>。然而，这一个孤零零的例子本身不但不具有代表性，反而是掩盖了文革初始阶段存在于全国的一个普遍的趋势，那就是：反对党委、反对工作组自发性群众运动在全国高校普遍存在，而这些自发性群众运动后来是在意识形态的理念层次上和中央文革结成联盟。六六年六月到八月间，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校中，工作组执行刘邓路线、镇压学生的自发运动，各地学生与工作组对抗，形“左”实右式的整人盛行，将学生打成反革命、学生被逼疯、被逼自杀的现象，以西安交大六·六事件、清华大学六·七事件、广西六·八事件、北京地院六·二〇事件、北师大六·二〇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为代表，全国各地都是惊人地一致。中央文革反复表态支持已经遍布全国各校园的反工作组的学生运动以后，造反的学生开始在精神上、理念上认同和支持中央文革。而各地造反派对中央文革的认同，反过来加强了中央文革的地位。这个联系不是靠政治交易或政治操纵建立的，而是建立在基本一致的政治观点之上，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联盟。正因为这个联盟是建立在反对血统论的共同认识上，而不是靠了任何官方命令性的权威，这个受毛泽东、中

央文革支持的联盟，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在北京及全国各地仍是少数派。

全面地看，文革中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思想理念的斗争。那些敢于“炮打”高层领导人的革命小将们，并非是因为有“内部情报”，或有“后台”，而是出于追究思想和路线上的是非，以及对“造反精神”的追求，无论左派或右派都是如此（笔者将另撰文分析文革中的派别以及“左、右”的意义）。官方文革史学喜好列举的两个事例就是六六年底蒯大富等组织的反对刘少奇的游行是受“四人帮”的授意，而进行反中央文革活动的李洪山、依林·涤西等人则被逮捕。似乎以此就能证明反对中央激进派的活动都是群众自发的，而反对走资派的活动却全是受精英操纵的。事实是：中央文革和各地造反派最主要的联系是对激进新颖的文革理念的认同；相反，各地的保守派除了对血统论和旧体制在理念上的认同外，更有旧体制的当权派不同程度上在幕后撑腰。就在上述两个事件的同时，也有大批反陶铸的群众被打成“反革命”。至于在首都之外的地方各省市，被逮捕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受中央文革支持、反对省委、反对省军区当权派的造反派。以致六七年二月毛泽东决定以释放北京一小撮极右派“联动”份子为条件，要求各省市全部释放在二月逆流中大批被捕的造反派学生。

### 继续革命论和反血统论的结合

“两个文革”论的最主要根据，是认为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文革期间群众中自发产生出来的造官僚的反对的思想理念，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在很多人的思维定式中，毛泽东作为集“极左”思想之大成的人，是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思想的。另一方面，一时间成为群众手中强大武器的大民主、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等，也不可能和“极左”的“社会主义新阶段”有什么必然联系。根据这两条假定，推论出毛泽东利用了文革中的群众运动，目的只是为了打倒上层集团中的政敌。然而，这种推论和文革历程中和文革后时期的一系列发展事实不符。

首先，在文革运动过程中并没有预先设定好的政敌。毛泽东六二年以后的新思想，党内大部分人都很不理解，然而，这并无法成为政敌的标准（刘少奇被打成叛徒一案，只能说是在文革的混乱之中横生出的一个枝节，后来喧宾夺主，最后被认为是文革的主要成果）。文革开展后的情况是：假如将反对造反运动的人算作所谓的“政敌”的话，那么“政敌”不是越打倒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反感文革的官僚势力对文革的抵抗到后期越来越强烈。六八年文革结束时，不是在打倒了大部分文革“政敌”的情况下，而是反对文革运动的势力愈演愈烈，以及打着“文革”的旗号搞形“左”实右镇压群众的手法普遍出现，有可能在全国再次发生类似武汉政变或更严重的事件。文革运动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匆匆地鸣锣收兵的。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在文革结束时以“今后还要搞许多次”来暗示全国的造反派。

这里不能不简单提及文革匆匆结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革后期（六七年八月以后）左派联盟发生了严重的破裂，不仅在中央的激进派内部发生离析，中央文革和地方造反派的关系也呈现紧张。这其中三个主要原因：一是群众造反派内部发生宗派主义纠纷；二是一小部分左派在理论上超前发展，而有些省份的造反运动则严重滞后，造成运动发展不平衡，各省的形势不能互相支持；而更重要的一点，也是造成前两个现象的原因，那就是还存有强大实力和资源的官僚保守派对左派阵营进行了有效的瓦解、分化和挑拨工作，这个十分重要的史实，在几乎所有文革史著中都没有提及。⑥

“两个文革”的论点所无法解释的另一个史实是：文革后时期毛泽东并没有收回他借以发动文革、并在文革中支持造反派的那些思想理论。毛泽东在文革后反而更加信誓旦旦地强调要反对修正主义，认为当时中国的很多方面还“和解放前差不多”，强调反官僚、反特权。毛泽东在文革后时期提倡的“反潮流”精神，很显然

是“造反有理”的再版。假如按“权力斗争”的说法，仅仅从“维护文革成果”和防止被打倒的“政敌”翻案的角度出发，是没有必要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尚存在的“阴暗面”、“变修变色的危险”、还要“反潮流”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无论在文革中还是文革后毛泽东都是在“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的高度理论层次上思考问题，而不是在打倒政敌、维护名誉的低层次上。

最后应指出，“两个文革”观点将毛泽东与文革群众运动割裂开来的企图是完全无法办到的。毛泽东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在抽象、宏观层次上为群众造反运动声张；在造反派群众中滋长出的反血统论思想，是在具体、微观层次上，给反修防修提供了活生生的社会学内容。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和群众的反血统论，这两个分别在抽象、宏观层次和具体、微观层次上的思想理论，在文革运动中互相提高补充，有机地结合成为一个缜密完整、强大有力的思想武器：它把文革中从上层到下层的一系列斗争，包括对热衷引进资本主义的党内官僚派的斗争，对这些官僚阶层的子弟家属所形成的特权集团的斗争，对当时社会中旧有的和新生的各种不平等关系的斗争，都集合到这个统一的斗争话语上来。假如我们也采用“思想体系”的说法，那么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依照他思路来展开的理论（包括陈伯达、张春桥等所作的理论工作），更包括以省无联《中国向何处去》为代表的民间左派理论，形成了一个有坚强内核的毛泽东晚年思想体系，也就是“继续革命”的思想体系。而六六年到六八年之间的群众运动，就成为这个思想体系一次具体实践。很难否认，《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中的思想和《五一六通知》、《五七指示》的思想属于一个体系，而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或哈维尔之类“自由”牌号的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则有云泥之别。

自从六十年代末世界范围内的反体制的左倾浪潮衰落以来，人们习惯于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反体制运动和“自由化”联系起来。苏联东欧体制内的民主运动，从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运动到苏联的萨哈洛夫和索尔仁尼琴，在批判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同时，一个比一个地更加走向社会主义理念的对立面。在对苏联体制的批判上，和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彻底改善的认识上，毛泽东和他们的看法有些是接近的。然而，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所存在的弊病的根源，毛泽东却开出了和他们完全相反的诊断和处方：“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sup>⑦</sup>一句话，毛泽东另辟蹊径，试图从左的方向去改革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革和六十年代大约同时期的西方新左派运动不谋而合：即看清了以苏联为中心的“旧左派”已经失去了和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的意志，反而转变成资本主义的热衷效仿者和忠实合作者。和中国文革遥相呼应、在时间上也重合的六八年“巴黎五月”运动，就是欧洲新左派的一次“文化革命”。在“五月运动”中，广大左派学生和群众突破了“旧左派”，即法国共产党对革命运动的垄断和压制，以自发的革命热情对抗资本主义制度。而亲苏的法共出于对资本主义秩序的维护，一直在阻挠和破坏自发的群众群动。只有无视这个“新左”和“旧左”的重大区别，才会得出“毛泽东坚持僵化的社会主义”之类肤浅至极的结论。无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大胆尝试，就如同井底之蛙，只看到从右的方面、以引进西方消费主义和资本剥削机制的改革的可能性，而丧失了从左的方面改革社会主义、从左的方面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想象力。值得一提的是，从右的方面改革社会主义的尝试，从赫鲁晓夫、盖达尔、戈尔巴乔夫，直到毛泽东之后的改革，无一例外地都走向对社会主义本身的否定。这条规律，毛泽东早就看到了，这也是他决心走另一条路的原因。另一方面，无视人民群众对革命思想的掌握能力和对社会主义的自发追求，也就无法理解“巴黎五月”和中国文革中人民群众越过已经趋向保守僵化的共产党、“自己解放自己”的真正政治倾向。有了这两方面的偏见，才会得出毛泽东在追求“僵化的社会主义”，而群众在追求“自由化”的“两个文革”的错误

结论。

-----

- ①《郑义论两个文革》刘宾雁摘自《历史的一部份——永远寄不出的十一封信》第四封；《开放》，总第66期。
- ②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王希哲论文集》，七十年代杂志社，1980年。
- ③杨曦光《评〈中国“文革”十年史〉》，《争鸣》，1990年8月号。
- 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北京。
- ⑤聂元梓等《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1966年5月25日，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
- ⑥Unger, Jonathan “Whither China? Yang Xiguang, Red Capitalists, and the Social Turmoil of the Culutural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Vol 17 No. 1, 1991.
- ⑦《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即“十六条”）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

□ 转载自《四大广场》第六期

-----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

本期责任编辑：[吴 放（美 国） <cnd-cm@cnd.org>](#)  
本期校对：[华新民（美 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徐名扬（澳大利亚）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胡 柯（美 国）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萧 同（美 国） <cnd-cord@cnd.org>](#)  
《CND》总编：[温 冰（加拿大） <cnd-manager@cnd.org>](#)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SUB（或 SIGNOFF）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版）

并请注明：SUB（或 SIGNOFF）CNDBRU-L FIRST LASTname

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TP）：[ftp.cnd.org](ftp://cnd.org)[132.249.229.100]: pub/hxwz

wz

（加拿大读者可用：[canada.cnd.org](http://canada.cnd.org)[142.132.12.100]: pub/cnd/hxwz

）

考访服务站（Gopher）：[cnd.org](http://cnd.org)（中文或英文目录）

万维网服务站（WWW）：<http://www.cnd.org/>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本期编辑用软件: XLBR2.0 ©严永欣 NJSTAR ©倪鸿波  
GBLIST ©陈公权  
本刊同时采用 ZWDOS ©魏亚桂 中文软件处理日常编务

---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XT